

中国问题

The Problem of China

伯特兰·罗素 / 著
秦悦 / 译



经济科学出版社
Economic Science Press

中国问题

The Problem of China

伯特兰·罗素 / 著
秦悦 / 译



经济科学出版社
Economic Scienc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问题：哲学家对 80 年前的中国印象 / (英) 罗素 (Russell, B.) 著；秦悦译. — 北京：经济科学出版社，2012

ISBN 978-7-5141-2634-1

I . ①中… II . ①罗… ②秦… III . ①政论 - 中国 - 民国 IV . ① D693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80547 号

责任编辑：张 力 孙大恒

责任印刷：王世伟

中国问题

罗 素 著

秦 悦 译

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社址：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：100142

总编部电话：88191217 发行部电话：88191537

网址：www.esp.com.cn

电子邮件：esp@esp.com.cn

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装

710 × 1000 16 开 15 印张 170000 字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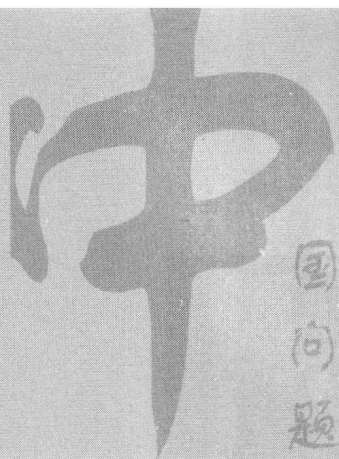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141-2634-1 定价：35.00 元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。电话：88191657)

(版权所有 翻译必究)

南海之帝为倏，北海之帝为忽，中央之帝为浑沌。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，浑沌待之甚善。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，曰：“人皆有七窍，以视听食息，此独无有，尝试凿之。”日凿一窍，七日而浑沌死。

——《庄子》



译者前言

仰望 20 世纪人类文明的星空，最耀眼的双子星座就是爱因斯坦和罗素。如果说，爱因斯坦代表自然科学的最高成就，那么，罗素就代表人文思考和终极关怀。而且，他们还有很多交集，比如在 1955 年联手发表《罗素—爱因斯坦宣言》，抗议核武器试验。爱因斯坦还宣称：“阅读罗素的作品，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。”

他们分别在各自领域内获得诺贝尔奖。罗素在获奖评语中被称为“当代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代言人，以及西方思想解放与言论自由的巨擘”，“他能把精湛的哲学思想成功地介绍给大众，并用来关心大众。他一生的事业皆在于热诚地为公众的良知辩护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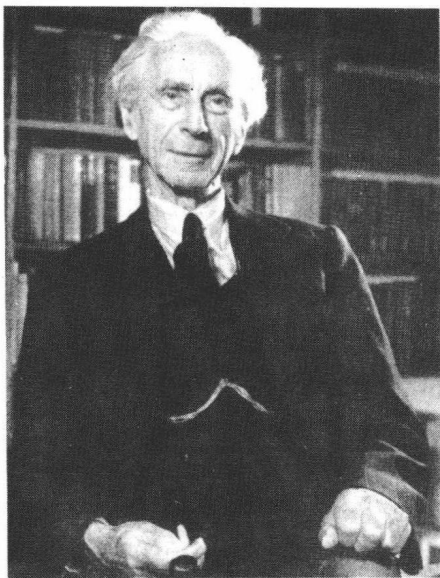
罗素在《我为什么活着》一文中的名言，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几代人的座右铭：“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，那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，对于知识的追求，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。”

一、罗素其人

伯特兰·罗素 (Bertrand Russell, 1872—1970 年)，英国哲

中国问题

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，被公认为“20 世纪最伟大的智者”。生于英国贵族家庭，1889 年获剑桥大学数学奖学金，1890 年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，1895 年任三一学院研究员，1908 年入选皇家学会会员，1910 年任三一学院逻辑和数学原理讲师，1916 年因参加反战活动受起诉而被三一学院解职，1918 年因发表



Bertrand Russell

罗素（1872—1970）

反美言论而坐牢 6 个月，1920 年访问苏俄，1920 年—1921 年访问中国，1938 年被聘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访问教授，1939 年被聘为美国加州大学哲学教授，1944 年任三一学院研究员，1950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，1961 年因参加反核示威以 90 岁高龄坐牢，1966 年与萨特等人组织“国际战犯审判法庭”，1970 年去世。

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，罗素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。他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格局，如数理逻辑、逻辑实证主义、自由教育思想，以及他的和平主义思想，都曾吸引过无数中国学人倾注的目光。而在现实人生中，他积极入世，投身和平主义，几度引来极大赞誉，可以说是一生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。

罗素曾于 1920 年应邀来中国讲学，其时罗素的不少著作已

通过翻译和介绍而为“五四”时期的新青年所熟悉。他著名的“五大讲演”虽不为人全部理解，甚至还有不少误读，却给中国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罗素一生著述颇丰，主要贡献在数理逻辑、自由教育思想以及和平主义思想。他在访华结束之后，于1922年在英国出版了专著《中国问题》(*The Problem of China*)。

二、 罗素的访华与讲演

“五四”时代的中国，渴求新思想如望春风。因此，我们迎来了两位最著名的大师：杜威和罗素。

罗素的访华日期是1920年10月12日至1921年7月11日。罗素访华虽然比杜威晚了一步，但他的影响并不在杜威之下。杜威与罗素曾在湖南见面，他们的哲学观点不同，甚至可以说是各自的劲敌，在个人交往上也谈不上喜欢对方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，比如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，他们曾联名发表向全世界的公开信和公开宣言，严厉谴责日军的暴行，并向国际社会呼吁和平。同时，杜威也曾多次帮助过罗素，为迎接罗素访华，杜威专门作了《现代的三个哲学家》的权威讲演；罗素在中国病重时，杜威也曾帮忙寻医问药；后来罗素赴美讲学遇到麻烦，杜威又站出来为罗素说话，颇有“我不赞成你的观点，但我会拼命维护你说话的权利”之风。巧合的是，罗素与杜威于1921年7月11日同时离开中国——这一天中国知识界同时送走了两位客人。

最早向梁启超提议邀请罗素访华讲学的，是时任北京大学讲师的傅铜。实际出面邀请罗素来华的，是“讲学社”，邀请函于

中国问题

1920年5月发出。“讲学社”是梁启超等人发起，实际有四家团体参与：北京大学、尚志学会、新学社和中国公学。罗素来华前，他的不少著作，如《社会改造原理》《政治理想》《自由之路》等均有中译本出版，报刊上也发表了不少介绍他的文章，以及他一些重要著作的梗概。加上杜威的介绍，罗素尚未踏上中国的土地，就已被誉为“新时代的大哲”和“世界哲学泰斗”。北京还成立了“罗素学说研究会”，出版《罗素月刊》。

罗素来华之后，作了“五大讲演”，分别题为“哲学问题”、“心之分析”、“物之分析”、“数学逻辑”和“社会结构学”。讲演地点大多在北京大学，只有“哲学问题”1920年11月14日之后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行。听众多达1500人，场面十分热烈。除了这“五大讲演”之外，罗素还马不停蹄地上海、杭州、南京、



罗素讲学期间在北京的住所

长沙、保定等地作了多场讲演。

《哲学问题》，罗素本来有专著问世，他在讲演中也有所发挥。他从“现象与实体”出发，深入浅出地讨论了唯心论、唯物论的来龙去脉，以最新的科学发展为依据，着重探讨了物质、心理、真理等问题，对于“别有新声于异邦”的中国知识界，无疑如久旱之后逢甘霖；《心之分析》也是一个系列讲座，几乎与《哲学问题》同时举行。顾名思义，这个讲座的内容倾向于心理学。罗素着重介绍了本能、习惯、欲念、感情、记忆、想象等心理学范畴的问题，并介绍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最新理论；《物之分析》，则着重介绍了相对论和量子论。由于这部分内容相对艰深，能听懂的人不多，因此讲演次数相对少一些；《数学逻辑》是罗素的专长，他介绍了数学逻辑的一些基本概念，可惜只讲了两次，因罗素患病而匆匆结束；《社会结构学》或许是中国听众最感兴趣的，但罗素并没有从中国的现实政治着眼去谈“社会改造”，而是偏重于理论上的阐发。

毫无疑问，中国的听众对罗素是失望的。

正如罗素在1920年10月18日的信件中指出的那样：“他们不要技术哲学，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。”尽管罗素曾经表示，他来中国，并不是研究中国哲学，而是研究中国社会状况，但刚来中国的罗素，显然无法给这种急切的提问以一个满意的、现成的答案。对报纸上出现的罗素主张教育和实业而非社会主义，陈独秀曾给罗素写信询问，但没有收到回信。毛泽东在湖南听了罗素《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》的讲演，同样也感到失望，他在1920年12月1日写给蔡和森的信中说，他对罗素主张的评

中国问题

论是“理论上说得通，事实上做不到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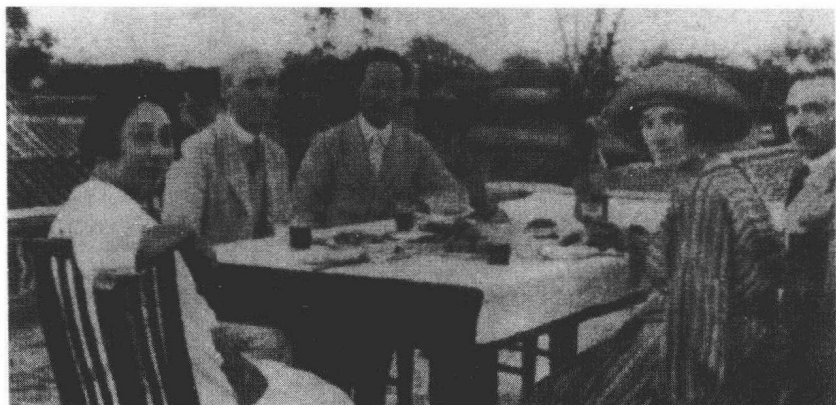
罗素在题为《少年中国之男女》的临别讲演中，多少为中国的未来有所指点，他充分肯定“少年中国”的进取精神，认为“现在中国的青年，颇富于进取的精神，是件可喜的事。”对于西化问题，他认为“中国人要不去专事模拟西方的方法，始可为自己的国家或世界图谋幸福”。在谈到如何对待中国旧文化时，他又重申：“既不要盲从西方的文化，也不要保存中国残留的文化。”他主张中国办教育、办实业，提倡爱国精神、公共精神和民主精神。



陪同罗素访华的勃拉克女士

罗素访华，给中国留下的回忆还不止这些。比如他关于国家社会主义、关于中国的国粹、关于西化的观点，曾引发了五四时期著名的思想论争；比如他的访华，备受英国当局的阻挠；比如他并不像杜威那样与妻子、女儿同行，却是带着一个尚未结婚的情人；比如他在寒冷的冬天作演讲，坚持脱去外衣以示礼貌，却因此重病一场，甚至读到了自己的讣告；比如他游览西湖时看到轿夫“含笑”而发出的感慨，却引起了鲁迅先生的评论；比如

为他做翻译的赵元任因随他在中国各地旅行而发现自己的语言天赋，进而成为语言学的一代宗师……最主要的是，罗素给中国留下了太多的思考。



与随行翻译赵元任夫妇的合影

罗素对中国的态度一直十分友好，自幼便从父辈的藏书中学了解并向往中国文明，他曾于1922年表示“愿为中国竭尽微诚”，曾不断撰文“为中国请愿”。在国际问题上，始终站在中国人民一边，谴责列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行径，并曾在1962年中印边界问题上，担任中印双方的调停人，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。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，罗素还在《西方的智慧》封面印上“一部献给毛泽东的著作”，并把自己的代表作《西方哲学史》寄赠毛泽东主席。与此同时，中国人民也十分尊重这位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的一代哲人。几十年来，罗素的几十种重要著作也在中国有了译本，甚至多个译本，深受欢迎。中国著名翻译家傅雷曾翻译过他的《幸福之路》。

回顾罗素对中国的巨大影响，我们不妨来看看这样一份

中国问题

名单：从孙中山、毛泽东，到当年的名人梁启超、张申府（崧年）、鲁迅、陈独秀、周作人、胡适、张东荪、林语堂、徐志摩、杨端六、赵元任，再到今天的学人冯崇义、朱学勤、袁伟时、龙应台……每一个名字下面，都有一段与罗素的佳话和珍闻。

三、《中国问题》

作为一位对人类进步事业十分关切和拥护的人文学者，罗素不仅深切同情和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正义斗争，而且一直对中国人民怀有特殊的真诚而友好的情感。《中国问题》就是罗素在这种背景和情感的驱使下，经过到中国实地考察后的系统思考。这位“世纪智者”对中国问题的思考，系统地反映了一个西方进步学者的中国观。

罗素结束在华讲学回英国之后，根据他的“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”，先是在英国各大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章，后于1922年出版了他唯一一部关于中国的专著《中国问题》，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见解。

《中国问题》主要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。然而，罗素却是立足于中国的立场谈中国的现实政治：关注中国军阀纷争的政治格局，剖析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，特别用很大篇幅介绍了日本的历史和中日关系的发展，指出中国经济、铁路交通、工业（尤其是矿业）的发展前景，呼吁中国重视实业、重视教育，呼唤“少年中国”的崛起。他所说的“少年中国”（Young China），是指“五四”时期的新青年，他们在国外或中国国内的现代学校里接受过或正接受着现代教育。与此同时，罗素又立足西方立场谈中国的历史、中西文化的对比和中国人的性格，有其独到的见解。

罗素是以一种深刻的历史感与全球意识来看待中国问题的，他看到了当年这个闭关锁国的文明古国在西方文明冲击下的困境，指出中国文明如果完全屈从于西方文明将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。

在罗素的全部著作中，《中国问题》并不十分抢眼，但它系统地反映了罗素对中国问题的成熟思考，集中体现了罗素在中国问题上的知识关怀、社会关怀，以及代表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终极关怀，对在他之后的中国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。罗素因此而被成为中国问题专家。

罗素本人也十分重视这部著作，直到晚年，还特地为1966年本书重印写了一篇《前言》，坚持书中的基本观点，并在其自传中提及此事。

《中国问题》一书，对后世的中国研究影响颇深。澳大利亚中国问题专家菲兹杰拉德（C. P. Fitzgerald，中文名费子智）评论该书具有“犀利而又敏锐的远见卓识”，“无论从哪种角度看，它都是一部出色的著作”。曾经为“从罗素”而不顾一切去英国的徐志摩，收到罗素赠书之后，立即撰写专文予以赞赏。孙中山先生则于1924年初撰写著名的《民族主义》一文，评价罗素是真正了解中国的为数不多的几位西方人之一：“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，除非在中国住了二三十年的外国人，或者是极大的哲学家，像罗素那样的人，有很好的眼光，一到中国来，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欧美，才赞美中国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中国问题》不仅体现了罗素对中国的影响，同时也反映了中国（尤其是中国之行）对罗素的影响。可以说，罗素给中国作了“五大讲演”，中国也给罗素上了深刻的一课。罗素

中国问题

与中国的这次思想碰撞，其结果十分让人为难：对“五四”时代的中国来说，现实需求是急迫的，而罗素是超前的，因此罗素在中国只可能拥有无数的崇拜者，却很难找到真正的知音。鉴于此，双方不免有点互相失望，这是可想而知的。

正如罗素在 1965 年 11 月为本书写的《前言》中所说的那样，书中谈及中西文化及中国人性格的部分，“总的来说仍然是正确的”。尽管时过境迁，书中所谈到的当时的中国时事早已成为人人皆知的历史，但作者对中国的历史、中国的文化、中国的教育及中国人的性格等问题的许多分析仍不失为真知灼见，令人觉得历久弥新。而他对中国未来的展望、对国际关系尤其中日关系的预言，至今仍不失为一份经典的天才预言，令人折服和感叹！重温这些具有超前性的深刻见解，对目前正经历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来讲，不啻是金玉良言。

解读罗素的《中国问题》这本与我们有关的名著，对于 21 世纪“大国崛起”背景下的中国人来说，将不仅有助于深刻地理解“五四”，还将有助于深刻地理解现实和面向未来。

我们不妨重温罗素在《中国问题》里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：“中国人曾经历磨难，但他们的英雄主义拯救了他们，他们应该成功。愿成功是他们的！”

四、关于《中国问题》中译本

本书的中译本原有 1924 年上海中华书局所出赵文锐译的《中国之问题》。该译本虽然出版及时，且经梁启超先生署检，可惜的是，这本“罗素近著”（梁启超题）过于贴近当时的时代，原书中不少

· 译者前言 ·

涉及时事的内容没有译出,其余内容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删。对于当今读者来说,其语言习惯也相去甚远。故此,我们重新翻译《中国问题》,介绍给当今的中国。

《中国问题》的英文版,有1922年、1966年和1993年三个版本。本书根据1993年版本译出。正如曾经担任罗素和平基金会的英国政治家肯·科茨在1993年前言中所说,1993年版本是一个集大成的版本,包括《中国问题》历年版本全部内容。这样,这个译本除了原作的《索引》部分之外,全部悉数译出,可称为全译本。限于时间和学识,译文中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,谨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我们愿以此来纪念罗素访华,纪念罗素对中国人民的友谊,纪念我们一起走过的这段丰富的历史,并以此献给 21 世纪的中国读者。



罗素与中国

——读罗素著《中国问题》

徐志摩

罗素去年回到伦敦以后，他的口液几乎为颂美中国消尽，他的门限也几乎为中国学生踏穿。他对我们真挚的情感、深刻的了解、彻底的同情，都可以很容易从他一提到中国奋烈的目睛和欣快的表情中看出。他有一次在乡下几于和卫伯(Sidney Webb)夫妇吵起嘴来，因为他们一对十余年来只是盲目地崇拜日本，蔑视中国。他对人说他很愿意舍弃欧洲物质上舒服的高等生活，到中国来做一个穿青布衫种田的农人。他



《中国问题》写作前后的罗素先生

说中国虽遭天灾人患，其实人民生活之快乐直非欧洲人所能想象。他说中国的青年是全世界意志最勇猛，解放最彻底，前途最无限的青年；他确信中国文艺复兴不久就有大成功。然而，他也知道我们的危险。他在英国每次发言，总告诫人说最美最高尚最优闲的中国文化，现在正在危险中，有于不知不觉中，变化为最俗最陋最匆促的青年会文化之倾向：他说现在耶稣教在中国的魔力，就蕴在青年会的冷水浴和哑铃操里面。太平洋那边吹过来的风，虽则似乎温和，却是充满了硝酸的化力。我离伦敦前接到他从瑞士来的电报，要我到巴黎去会他，后来彼此还是莫有会成，但他寄来送我一本他的新书《中国问题》，叫我到国内来传布他的意见，我答应回来温习过自己的社会人民以后，替他作一篇书评。如今我回国已有一月，文章还不曾作出，现在我姑且先用中文来传达他书里的一番厚意，好让爱敬罗素的诸君，知道我们得了个真正知心多情的朋友在海外哩。

罗素这本书，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经程中，确实地新立了一块界石。他是真了解真爱惜中国文化的一个人，说的话都是同情化的正确见解，不比得传教士的隔著靴子搔痒，或是巡捕房头目的蹲在木堆里钓鱼。他唯其了解，所以明白我国过去文化的价值和将来发展的方向；唯其爱惜，所以不厌回复地警告欧人不要横加干涉，责备日本不应故意蹂躏，隐讽美国不要用喜笑的脸温存的手，来丑变低化我们的遗产。他开头就说在中国的三大问题——政治、经济、文化——中关于全人类和中国自身最重要的是文化问题；只要这个问题解决的满意，不论政治经济化成如何样式，他都不在乎了。他说中国好比一个美术家的国，有美术家的好处也有他的坏处，但这好处是有益于人的，坏处只报应在他自身。他就问一个重要的问题，他问如此说来，全世界是否应得设法保全他的好处呢，还是逼迫他去学欧洲的坏样子，专做损人不利己的事业呢？他再问，果